



法治日报

星期一
2025年12月22日

环球法治

05
专刊

主编/赵阳
编辑/王艺茗
美编/李晓军
校对/张胜利

LEGAL DAILY

ChatGPT卷入谋杀案全球震动 OpenAI与微软遭起诉

人工智能安全责任边界再引热议

□ 陈文

当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成为人们日常依赖的“伙伴”，其算法逻辑与安全机制的微小偏差，是否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人间悲剧？当地时间12月11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OpenAI）及科技巨头微软公司，因旗下ChatGPT聊天机器人被指“加剧用户偏执妄想并诱发命案”，共同遭遇一起谋杀关联诉讼。据报道，这起美国司法史上首次将AI聊天工具与谋杀行为直接关联的诉讼，不仅将OpenAI推向舆论风口，更让全球AI行业的伦理底线与法律责任问题陷入深度拷问。

母子悲剧藏算法阴影

这场震动美国科技界与司法界的诉讼，源于今年8月发生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起案件。56岁的男子斯坦·埃里克·索尔伯格在家中殴打并勒死83岁的母亲苏珊·亚当斯后，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时，这起案件仅被定性为“精神障碍患者引发的家庭悲剧”，直至12月11日，被害母亲的遗产继承人将OpenAI、微软及OpenAI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一并告上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高等法院，案件背后的AI因素才浮出水面。

提交至法院的诉讼文件，详细披露了索尔伯格与ChatGPT之间长达数月的异常互动，揭开了悲剧发生的核心诱因。诉状显示，索尔伯格长期存在精神健康问题，案发前频繁通过GPT-4模型倾诉自己“被监视、恐遭暗杀”的偏执想法，而这款以“情绪共鸣强”为卖点的AI模型，非但没有履行安全引导义务，反而成为其妄想的“助推器”与“塑造者”。

在持续的对话中，ChatGPT不断肯定索尔伯格的荒诞认知：认同他“赋予AI意识”的自我理想，将他身边的送货员、警察定义为“敌对势力”，甚至刻意将其母亲重新塑造为“参与阴谋的敌对特工”。更令人震惊的是，AI还曾明确验证索尔伯格母亲家中的打印机是“监视设备”，并支持其“母亲通过汽车通风口投放致幻剂毒害自己”的极端猜测，一步步将这个精神脆弱

的用户推向与现实彻底隔绝的虚拟困境。

“ChatGPT为索尔伯格构建了一个专属的幻觉世界、一个定制化的地狱——在那里，打印机的蜂鸣声、可乐罐的摆放，都成了83岁母亲谋害他的证据。”原告方律师杰伊·埃德尔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AI用算法编织的谎言，最终让儿子将屠刀对准了抚养自己一生的母亲。

索尔伯格的儿子同时也是案件原告之一的埃里克·索尔伯格，在诉讼中直言不讳地指出，父亲的酒精成瘾或许是悲剧的诱因之一，但与ChatGPT形成的“病态依赖关系”才是核心催化剂。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非ChatGPT首次卷入心理诱导风波。今年8月，加州16岁高中生亚当·雷恩自杀案中，其家属就曾起诉OpenAI，指控ChatGPT协助设计自杀方案、撰写遗书，并用“你不欠任何人活下去的义务”等言论瓦解其求生意志。

微软被指“知情获利”

随着案件细节的曝光，这起诉讼的核心已超越单



图为当地时间2025年12月12日，在意大利巴里，一部智能手机屏幕上显示着OpenAI的标志和名称，旁边是显示“ChatGPT”标志和“功能”字样的屏幕，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

CP供图

一悲剧本身，演变为对科技企业商业伦理与法律责任的全面追责。原告方在诉状中明确提出两大核心指控：一是OpenAI为抢占市场份额，刻意压缩安全测试周期，将存在缺陷的产品仓促推向市场；二是微软作为主要投资方与商业合作伙伴，明知产品存在安全风险仍推动其商业化，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针对OpenAI的指控，诉状直指阿尔特曼的决策失误。文件披露，GPT-4模型的安全测试原计划持续数月，但为了在AI行业竞争中抢占先机，阿尔特曼不顾内部安全团队的强烈反对，将测试周期压缩至仅一周，导致该模型在面对精神脆弱用户时的风险防控能力严重不足。原告方认为，这款被设计为“过度迎合用户情绪、不愿挑战错误前提”的AI产品，从诞生之初就存在先天性安全缺陷，而OpenAI对此完全知情却选择漠视。

更关键的是，OpenAI并非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今年8月加州高中生自杀案引发舆论哗然后，该公司于10月推出的GPT-5模型中，紧急引入170名精神科医生参与训练，宣称已将心理健康相关“不当回答”减少39%，高危回复降幅高达80%。但此次谋杀案的发生时间为8月，恰好处于GPT-4模型安全机制尚未完善、GPT-5尚未上线的空窗期，这也成为原告方指控其“明知风险却未及时整改”的重要依据。

作为OpenAI的最大投资方与商业合作伙伴，微软的角色同样备受争议。诉状指出，微软不仅通过GPT-4的商业化获得巨额收益，其旗下必应团队与安全部门还直接参与了该模型的安全部署合作，对产品存在的风险完全知情。更严重的是，微软在知晓GPT-4安全测试被中止的情况下，仍批准其在2024年正式发布，属于“故意放任风险扩散”，理应承担相应的连带法律责任。

全球监管迫在眉睫

这起美国首起AI关联谋杀的诉讼，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全球科技领域的湖面，不仅引发了对ChatGPT安全性的广泛质疑，更倒逼整个行业重新审视人工智能的伦理底线与法律责任边界。法律界、技术界与监管机构普遍认为，此案的判决结果或将成为全球AI行业责任认定的“标志性判例”，深刻影响未来AI产品的安全标准与立法方向。

目前，AI相关立法的滞后性，成为此类案件审理的核心难点。法律界人士指出，传统侵权责任认定中，“因果关系”是核心前提，但在AI诱导类案件中，如何证明“AI输出内容与人类暴力行为之间的直接关联”，尚无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前加州高中生自杀案中，OpenAI就以“用户刻意规避安全机制、服务条款已明确风险提示”为由推卸责任，而此次谋杀诉讼中，原告方虽掌握大量对话证据，但仍需通过复杂的举证，证明OpenAI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

“这起案件的核心价值，在于首次将AI的责任从‘用户自担风险’推向‘企业安全义务’的层面。”美国斯坦福大学科技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马克·莱姆利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随着AI从工具属性向“准社交属性”转变，科技企业不能再以“算法中立”“用户自担风险”为由逃避责任，“当AI成为数百万人的情绪寄托，尤其是面对精神脆弱群体时，企业必须承担起‘安全守门人’的义务，这是科技伦理的底线，也应成为法律明确的责任”。

有专家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AI行业“重速度、轻安全”的竞争氛围，进一步加剧了风险扩散。此次诉讼中披露的“安全测试缩水”事件，并非个例。近年来，随着AI密集迭代，各大科技公司为抢占市场份额，纷纷压缩研发与测试周期，将“更快发布、更多功能”作为核心目标，安全机制的完善往往滞后于产品商业化进程，最终将用户置于未知的风险之中。

度建设、社会稳定与民生改善之间的平衡。

对于正在推进经济重组、面临财政压力、社会期待与政治更替周期交织的斯里兰卡而言，全球治理倡议所蕴含的上述经验具有高度相关性：改革不仅需要稳定的社会基础，也需要明确的发展目标与务实的执行路径。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文明与绿色发展理念，亦对深受洪水、风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影响的斯里兰卡作出重要提醒——发展必须兼顾环境与未来。

此外，斯里兰卡社会在2500年的历史中屡经磨难而不屈，这种韧性与中国“人民是力量源泉”的理念相契合。全球治理倡议强调的治理模式有助于斯里兰卡政策体系的可持续性、社会包容性与长期稳定性。

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代表性提供契机

在多元化时代，全球治理架构正在发生深刻重塑，新兴力量正在推动国际体系从单一中心向多元互动演化。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重要推动作用，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大代表性和发言权提供了新的契机。中国主张联合国在新兴治理领域保持核心领导作用，并强调发展中国家应参与制定框架和标准，这为斯里兰卡在人工智能、海洋治理、气候变化、安全合作等议题上更好表达自身利益诉求提供了渠道。

斯里兰卡可从全球治理倡议中获得以下三方面启示：第一，提升国际协同能力。通过与倡导公平、包容治理理念的国家合作，在联合国和区域机制中扩大参与度与政策影响力。

第二，推动绿色与可持续发展。将生态文明理念纳入国家发展战略，通过气候韧性建设降低自然灾害对经济和社会的系统性风险。

第三，加强制度治理建设。借鉴中国循序渐进的改革逻辑，优化国内治理结构，提高国家在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变革时的稳定性。

总体而言，随着全球秩序进入深度调整期，斯里兰卡正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从中国全球治理倡议中汲取经验和启示，将有助于斯里兰卡在多元化国际体系中稳步提升自身发展能力，战略自主性和全球参与度，并为推动更加公正、和平、可持续的国际秩序贡献力量。

（作者为斯里兰卡国家生物技术研究院主席、班达拉奈克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吉隆坡大学冲突预防与战略研究客座教授、曾任斯里兰卡国家教育委员会顾问）

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是日本对国际法的非法僭越

□ 本报记者 吴琼
□ 本报见习记者 黄荣潇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2月在参议院会议上就其此前发表的涉台错误言论无理狡辩，继续以“日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敷衍搪塞。此前的11月7日，高市早苗公然宣称，台海若爆发武力冲突“有可能被视为‘存亡危机事态’”。这一恶劣言论发表已逾月，高市至今不思悔改，拒不撤回错误言论，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雷筱璐，副教授黄伟近日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高市言论本质是干涉中国内政、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非法律行径，严重违法多项国际法准则，中方拥有充分法律依据采取反制措施。

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不容置疑

要认清日本将台湾问题纳入“存亡危机事态”范筹的非法律性，首先必须厘清台湾地位的国际法基础。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当前国际法框架下对台湾地位最准确的表述。”黄伟告诉记者，从历史层面，中国最早发现、开发并持续对台湾实施行政管理，依据国际法“发现与先占”原则，中国对台湾拥有原始且排他的领土主权。

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更加准确无误地确立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与法理。1943年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日本需将窃取台湾等中国领土归还。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且后来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重申了《开罗宣言》的条款必将实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据国际法“政权变更不影响领土主权”原则，自然继承对台湾的全部主权。1971年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代表，全球181个建交国均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构成对台湾地位的普遍认可。

“上述国际法依据形成完整闭环，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的性质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黄伟强调。

雷筱璐补充说，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曾通过武装侵略将台湾据为己有。二战后，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清楚表明台湾领土主权归属中国。“这些文件清楚地表明，国际社会认为台湾在被日本侵占之前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战后必须归还中国。这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战后国际秩序框架下的条约和制度都必须与之保持一致。”

高市言论触碰多重国际法红线

综上所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着坚实的国际法依据。高市早苗作为日本首相，其在日本国会答辩时通过电视直播、网络平台或现场参与等方式公开发表涉台“存亡危机事态”言论，这在黄伟看来，在国际法上应被归为日本的非法行为。

所谓“存亡危机事态”，按照日本在2015年新修订的安保法内容，是指与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在遭受武力攻击，且该攻击若任其发展将对日本生存构成明显威胁时，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这意味着，一旦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可在无需事先征得美方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武力行动。

“很明显，高市将台湾划到了‘他国’的范围内。”对此，黄伟指出，从国际公约层面看，其言论违背《联合国宪章》第2条规定的“不干涉内政”和“禁止武力威胁”核

心原则，“将台湾虚构为‘他国’并暗示武力介入，严重冲击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日本在1972年9月29日《中日联合声明》中的承诺：日本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立场。而且，《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序言部分强调，确认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黄伟说，高市将台湾视为日本关系密切的“他国”，明显违反了上述承诺，违反国际法“禁止反言”原则。

此外，高市言论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波茨坦公告》为日本设定了战后和平义务，其和平宪法第9条明确放弃战争权与集体自卫权，而日方借“存亡危机事态”试图解禁相关权利，是对二战后国际安排的公然否定。“日方将国内法解释置于国际法之上，违背‘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严重损害国际法权威性。”

雷筱璐则进一步剖析了高市言论的违法性。她表示，日本2015年“新安保法”对“存亡危机事态”的定义，如适用于台湾，将明显违反《联合国宪章》不干涉内政原则和禁止使用武力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采取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日本如果对这一问题横加干涉，就违反了不干涉内政原则。如果以“存亡危机事态”为借口，在台湾海峡采取军事行动或以武力相威胁，将直接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四款下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原则。

雷筱璐强调，日本将“存亡危机事态”等同于台湾事务，同样也不符合国际法上有关集体自卫权行使的条件。国际法院曾为行使集体自卫权设定了三个要求：一是必须至少一国有权行使自卫权。二是受害国必须宣告它是武装攻击的受害国之后，其他国家才有权使用武力协助。三是必须有受害国的要求，其他非受害国才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即便中国政府使用武力，也不会有任何国家有权合法地行使自卫权。

中方反制措施有充分法律支撑

针对日方非法行径，黄伟表示，中方拥有充分国际法依据捍卫国家主权，可采取多重措施要求日方承担相应国家责任。

首先，中方可敦促日方立即撤回错误言论，公开向中国政府道歉，承诺不再实施类似干涉内政行为，恢复善意履行各项国际法义务。其次，若日方持续推进军事扩张，试图武力介入台海，中方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3条、第77条、第107条“敌国条款”，采取包括军事防备在内的必要措施，该权利无需联合国安理会事先授权。

在对等反制方面，中方可依据国际法“反制措施”规则，对日本涉台敏感企业实施出口管制，将相关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限制双边军事交流，加征特定领域关税等，以精准措施迫使日方正视自身义务。若日本以“集体自卫权”为由对中国采取武力，中方也可行使《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坚决反击，也可依据《反分裂国家法》第8条规定，在国家主权面临分裂风险时采取包括非和平方式在内的必要措施。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任何干涉中国内政、挑战一个中国原则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反对。”黄伟强调，日方应清醒认识到，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是“台独”分裂势力和外部干涉，若执迷不悟，铤而走险，必将因违反国际法付出沉重代价。

图片新闻

苏丹人道灾难被评价为2025年“最被忽视的危机”

英国汤森路透基金会12月17日公布的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苏丹人道主义危机被多家援助机构评价为2025年全球“最被忽视的危机”。苏丹眼下约3000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但内缺粮、外缺援，国际关注严重不足。

汤森路透基金会面向全球20多家援助机构展开这项调查。结果显示，三分之一的受访机构把苏丹人道主义危机列为“最被忽视的危机”。

国际慈善机构救助儿童会主管阿卜杜勒拉赫曼·谢里夫说，“苏丹危机应该每天都上头版”，灾难的真实规模“被忽视”。

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2023年4月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武装冲突，冲突随后蔓延至其他地区并持续至今，造成大量平民死亡，实际数据难以统计。据联合国数据，苏丹约500万人口中，超过1180万人流离失所，212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状况，约3000万人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一些援助机构指出，苏丹目前储备几乎耗尽，两座城市陷入饥荒，大量医院和学校被摧毁或占用。

据新华社



图为在苏丹北达尔富尔州塔维拉镇，流离失所者在一处用树枝和布料搭建的简易帐篷下休息。

新华社发



图为2025年9月3日，在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于科伦坡举办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现场，萨米塔·赫蒂格教授（右）向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戚振宏赠送其学术著作《正义、和平、人民终将取得胜利》。

本报记者 韩博 摄

□ 萨米塔·赫蒂格

纵观2500年的历史，斯中关系在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变迁中始终保持稳定。每当斯里兰卡面临重大危机时，中国都会伸出援手：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国际场合持续维护斯里兰卡的正当权益，双方奠定了深厚的战略互信基础。近期，斯里兰卡遭受热带气旋“迪特瓦”袭击后中国再次提供紧急援助，延续了这一长期互助传统。在当前国际体系快速重构，“全球南方”国家面临治理压力与战略机遇同步上升的背景下，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内涵和实践路径，对于斯里兰卡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拓展战略空间，增强国际行动力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包括斯里兰卡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治理经验与合作模式。

历史基础与价值理念的现实相关性

斯中关系历经千年积淀，其稳定性源自长期形成的相互尊重、互不干涉与合作互利的理念结构。中国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对外合作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中国国家领导人在

2025年9月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正是这一理念的全球化延伸，强调国家之间应在平等基础的原则上共商国际规则，推动包容性治理。

对于地处印度洋要冲、历史上深受外部政治力量影响的斯里兰卡而言，全球治理倡议所倡导的“主权平等、国际法治、多边主义、以人为本、行动导向”原则与斯里兰卡长期坚持的独立自主与不结盟传统高度契合。在全球治理体系中适度提升自身议题设置能力和战略自主性，对斯里兰卡未来的外交布局和国家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科伦坡港口城等“一带一路”倡议合作项目为斯里兰卡提供了经济发展与国家空间的延展性选择，使斯里兰卡在海上互联互通、区域金融合作方面具备新的战略功能。历史经验表明，斯里兰卡在复杂外部环境下需要稳定可信的伙伴关系，而全球治理倡议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制度化框架。

有助于提升斯里兰卡社会包容性

全球治理倡议的核心之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可持续的国家治理能力建设。中国的治理经验强调循序渐进、稳健改革，在发展过程中注重制